

第二章 清代之學術背景與環境

本章將從兩個面向作一呈現：首先，從明朝末年之亂象進行探究，其對清朝時代之走向所造成之影響，其中分作政治、社會、外交三條軸線進行分析，另外也檢討清廷運用種種策略，成功解決明末以來之政治弊端以及社會亂源，促使國家走向大一統盛世的情形。

其次，因清代之盛世基礎，使學術在此優渥之環境下，得以成長茁壯、開花結果。因此在整個清代學術環境中，必須就二個層次進行考察，一是學術之內在軌跡，一朝學術之演變，必然與前朝學術有密切之關聯，將是本章觀察之重點。另一是政策之外在影響，政策足以影響當朝學術之趨向，因此朝、野之學術路徑，亦是本章重要之觀察線索。

第一節 清初之時代背景

明代之所以亡國，可歸咎於以下數端：一是皇權不振，權臣誤國；二是流寇之禍，社會動蕩；三是財政拮据，經濟窘困；四是國防薄弱，處處失利。¹明代中葉以後，秕政叢出，於是東林黨爭繼起，無錫東林書院，乃顧憲成與高攀龍等講學之所，天下士人聞風而至，講學之餘，「往往諷議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朝士慕之，遙相應和，由是東林之名大著，忌者益多」²，故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云：「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，廟堂亦有畏忌。」³顧炎武對清議的作用評價很高，其云：「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，猶足以維持一二，至於清議亡，而干戈至矣。」⁴晚明清議主要通過議論朝政得失與朝臣品行，對朝廷政事發揮一定的監督和影響，士大夫通過這種輿論工具與宦官抗衡，於是朋黨既分，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二派，黨爭愈烈。

熹宗時，魏忠賢獲皇帝寵信，於朝廷內凡不如意者，設計殘害，其後任用黨羽為相，日漸恣肆囂張並引發東林黨禍⁵，逮捕楊左等六君子：楊漣、左光斗、

¹參考自蕭一山說法認為「明亡於苛政及流寇之禍」見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年2月），卷上，頁236-255。金兆豐認為「明亡之關鍵在於流寇之禍」見金兆豐：《清史大綱》（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0年9月），頁110-118。而筆者將之歸納為四端。

²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，頁229。

³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》〈東林學案〉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1年），頁625。

⁴顧炎武：《日知錄》卷十三〈清議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56年4月），頁48。

⁵參見蕭一山論述東林黨禍「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，語語皆可指實，而帝不悟，中旨切責。諸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，帝反溫諭數忠賢動勞，責諸臣附和。忠賢矯殺萬燝，借以立威。於是希

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顧大章等人，皆死於獄中，高攀龍自投於池，其他東林黨人或殺或罷，自此朝廷善類一空。及信王立，魏忠賢乃伏法，然國勢之壞，於此可知。

崇禎初，政令顛倒反覆，各省災荒不斷，以致民不聊生，遊民四起，終成流寇剽掠郡縣，其中高迎祥、張獻忠、李自成最強。群盜四竄，後共推李自成為闖王，崇禎十七年（西元1644年），李自成為首之流寇，迅速攻下山西幾十個州縣，三月十九日直搗北京，崇禎皇帝自縊而死。另一方面，吳三桂鎮守山海關，知京城淪陷，家人被虜，轉向多爾袞請求援兵，於是清軍入關，平定流寇。時京師百姓，以為是義兵之來，為復君父仇，皆對清軍夾道跪迎。多爾袞為安定民心，於京師為崇禎帝服喪三日，下令嚴飾軍隊搶奪，孤苦無依者予以贍養，沿途所至，皆以收拾民心，體貼民情。

清朝入關後，統治者即採取籠絡手段，減輕人民剝削，改革明朝弊政策略。首先為崇禎帝、后發喪，保護明陵，其次保障明朝王室利益，優待並重用明朝降官，像是洪承疇等人，再者開科取士，消除漢族士大夫反清思想。而在改革明朝弊政方面，打擊宦官勢力，明末宦官勢力極為猖獗，不僅操縱朝政，對百姓迫害甚深；另一項措施即改革吏治，嚴飭貪污。

只是清廷一方面採取了爭取民心，穩定局面的措施，另一方面也頒布剃髮令、圈地、掠人為奴等加深民族矛盾的措施，以致各地興起抗爭。只是此時偏安江南之明末政權，未能力圖振作，政權內部腐敗，黨爭不已，最後無力回天，終究被清軍所收平，自此清朝統治更形穩固。

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明制，但有鑒於明代權臣專權、宦官擅權、朋黨亂政等等導致國傾之局，於是清代統治者吸取歷史教訓，採取一些有效措施，不斷加強皇權，達到中央集權。這些措施⁶包括有：一、不斷削弱八旗旗主的勢力，康熙親政後，即清除鰲拜勢力，使「上三旗」的權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，進一步加強對八旗的控制。二、嚴格控制宦官權勢，清入主中原之初，記取明朝宦官亂政教訓，順治、康熙兩朝都制定嚴懲太監干政之條例，康熙還曾下令搗毀明朝禍國殃民太監魏忠賢之墓，對宦官勢力之削弱可謂最有成效者。三、抑制打擊朋黨勢力，大臣朋黨自明代以來，對皇權一直是一大威脅，於是康熙進行有效抑制、

指者更劾楊左（光斗）諸人，黨同伐異，招權納賄，東林之禍遂作。先是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，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名目，為《點將錄》，令忠賢按名黜汰，崔呈秀復進《同志天鑒》諸錄，分別異道，由此群小登據，善類一空。」見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，頁 230-231。

⁶參見李治亭主編：《清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，頁 655-658。

粉碎朋黨勢力，像是鰲拜、索額圖等勢力，無疑是有利於皇權之鞏固。

康熙朝在平定吳三桂之亂，收復台灣之後，轉而解決北部邊疆的安全問題，經協商簽訂平等的「中俄尼布楚條約」，平定噶爾丹之亂，又舉行內外蒙會盟，成功取得北部邊境的安寧。而在西藏方面，成功降服維吾爾人，自此加強管理西藏地方。而在內政方面，特別解決明代以來吏治敗壞的問題，嚴格考核官員、懲貪獎廉，加強整肅吏治。在社會經濟方面，獎勵縉紳招民墾荒，統一賦役徵收標準，如此可防止弊端發生，相對減輕百姓負擔，晚年更頒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及輪免全國各省錢糧一周，這二項正是國家財政收入持盈，社會經濟繁榮，人民賦稅減輕之一重要指標。而康熙另一重要政策，即是治理黃河，此項舉措關係國計民生，有利社會安定，自康熙以來，全面興修水利，歷時達三十年之久，清朝自此大治天下，因此出現政通人和，社會安定，呈現出盛世景象。

雍正朝，大體上按康熙生前為政之路，繼承其治國的基本方針，惟康熙末期，為政稍寬，吏治鬆弛，出現敗壞之象，惡劣風氣有滋蔓之勢，於是雍正整頓吏治勢在必行。經過數年雷厲風行，一改前朝晚年頹廢吏風，官吏大多能奉公守法，百姓少受其害，社會穩定。在政治上，有以下幾項作為：一是設立軍機處，辦理皇帝交辦事宜，直接向皇帝負責，無須經過內閣及議政王大臣會議，自此君權得到極大提高。二是改土歸流制度，大舉廢除元代以來，西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制度，改用流官加強嚴密統治，鞏固邊防，強化中央集權。

在民生經濟方面，李治亭特別於《清史》一書中提到：「世宗除了繼承聖祖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，特別是培養並扶植小農經濟的政策，如興修水利、旗地租佃關係的改革、准許部分壯丁開戶和出旗為民、蠲免錢糧、打擊貪官污吏等等。」⁷非僅如此，雍正又實行了一些發展經濟的新舉措，如成立會考府，清查中央和地方的地丁錢糧污空，對侵占挪用錢糧、貪污納賄的官員進行嚴厲懲處。另外，在康熙後期實施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」的基礎上，推行「地丁合一」的改革措施，主要是簡化賦役的徵收辦法，民納地丁之外，別無徭役，減輕農民的負擔，可促進社會生產發展。

繼雍正朝之後的乾隆朝，其治國理念是總結康熙與雍正治國經驗教訓而來，採取寬嚴並濟，治道貴乎一中，不矯枉過正。在此原則下，政務上採取幾項措施：一是糾正前朝政治錯案；二是嚴懲貪官污吏；三是嚴禁朋黨再起；四是重新設立軍機處。如此加強中央集權，同時亦平反雍正時之冤案，肅清朝野不當勢力，亦

⁷參見李治亭主編：《清史》，頁 891。

能減輕民間負擔，於此深得民心。

而清廷在統治邊疆的成就上，在康乾時期達到極盛。乾隆多次軍事行動，自此確立中國版圖，當時，我國疆域北至恰克圖，南至南海諸島，西至巴爾喀什湖，東至黑龍江庫頁島，幅員廣大，盛於明朝，清朝亦成爲當時亞洲最大，世界上可數的繁榮強盛之國。

盛世之出現，必然伴隨著衰弱之因，乾隆中期以後國勢漸衰之原因⁸：一是和坤專政；二是官吏貪贖；三是軍事廢弛；四是財政虛耗；五是乾隆皇之逸侈等多項因素導致清代由盛轉衰的重要指標。繼之而起的是各地亂軍四起，清軍忙於四處滅火，雖然大致消弭各地戰火，然此時國力大傷，至嘉慶、道光以後走向無可挽回的衰弱之路。

另一方面，清朝的對外關係上，清代前期中國與朝鮮、日本、越南、緬甸、尼泊爾等鄰近國家，以及與南洋群島諸國在政治、文化、經濟往來頻繁。清朝初年，中國與朝鮮就建立了政府間聯繫，兩國使節往來頻繁，甚是親善，兩國文化上的來往也很多，每年來北京的朝鮮使節團，除購書外，與中國著名學者紀昀、孫星衍等結交，互有詩文、書信之往來。中日兩國亦是交往密切，除貿易往來頻繁，清代學者留居日本不在少數，像是清初學者朱舜水、陳元贊等人對日本文學造成不小的影響。

隨著西方文化前來中國，中國的宗教更加多元化，清入主中原後，即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，同時利用佛教和道教來維護統治，宣揚「儒、釋、道」三位一體。由於明代以來，佛教日趨衰敗，於是佛教就向儒家思想靠近，用儒家思想解釋佛經十分盛行。而道教發展到清代，除演化成一些秘密宗教組織以外，已走向沒落。而天主教傳入中國，早在唐代和元代曾兩次大規模傳入中國，由於西方傳教士以科學技術爲傳教手段，亦尊重中國風俗習慣，因此得以在中國迅速發展。直至康熙三年，信徒已多達十一萬多人⁹，傳教士也得到清廷的信任，不僅可四處傳教，有些還被聘任官職，像是南懷仁被任命爲欽天監監正，後更奉清廷之命鑄造戰炮；有些還以翻譯官身分參加中俄尼布楚談判等，於此反映這一時期，清朝統治者與天主教教士的密切關係。

但康熙晚年，卻又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，禁教的主因，在於羅馬教廷對中國天主教徒政策的改變，羅馬教皇禁止中國信徒祀天、尊孔、祭祖等禁令，

⁸參見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，頁 209-240。

⁹方豪：《中西交通史》（長沙：岳麓出版社，1987 年 12 月），頁 977。

此禁令明顯與中國傳統文化衝突，方引起康熙之禁教令，這一禁令長達一百二十年，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才被迫撤銷。因此宗教能得以在中國國內發展，勢必先贏得清朝統治者的信任，其次不得有違中國傳統文化，否則斷難在中國立足。

在此時代環境氛圍，中國在對外關係，或有文化交流，或有領土爭端，清儒在此關係的表現上，或有領軍出征，或消弭內亂，然而清儒得與西方傳教士有所學術切磋，因此西方文化的傳入，對中國傳統文化，相對產生不少的衝突與影響，清代學術在此時代背景下，也就能得到豐富的孕育與發展。

第二節 清代學術環境

壹、清代學術氛圍

一代學術之成立，皆有其相當之時勢與環境促成，茲就學術理路及政治措施二方面，探究清代學術氛圍。

一、學術理路

明中葉以後，正統的程朱之學已因八股文制義而支離破碎，學者只知《四書大全》與《五經大全》，對於經書原文反而棄之不顧。後王陽明「致良知」學說興起，學者逐漸輕視讀書的功效，再加上當時講學風氣盛行，所談論的盡是「語錄糟粕」，於是王學末流，便養成束書不觀，游談無根的習氣。在這種學風日益墮落的情形下，能躬自反省的日漸少，而猖狂恣肆者日漸多。¹⁰明末清初有識之士，便群起攻擊，如黃宗羲所言：「明人講學，襲語錄糟粕，不以六經為根柢，束書而從事於游談。」¹¹陸隴其更是大加批評：

王氏之學徧天下，幾以為聖人復起；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，滅裂無餘。學術壞而風俗隨之，其弊也，至於蕩軼禮法，蔑視倫常。天下之人，恣睢橫肆，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，而百病交作。……至於啟、禎之際，

¹⁰參見孫劍秋：〈清代漢學形成原因綜論〉，《第二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中山大學中文系編印，1991年11月），頁29。以及王家儉：〈晚明的實學思潮〉，《漢學研究》，第7卷第2期，1989年12月，頁4-5。

¹¹全祖望：〈梨洲先生神道碑文〉，《鮚埼亭集》卷11，收入《四部叢刊正編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11月），頁130。

風俗愈壞，禮義掃地，以至於不可收拾。¹²

這段話明顯的將明亡的責任，歸於王學末流，風俗敗壞，以至不可收拾。於是顧炎武提出王學之流弊：

理學之名，自宋人始有之，古之所謂理學，經學也。……今之所謂理學，禪學也。不取之五經，而但資之語錄，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。¹³

顧氏認為古人以學經為儒，今人所談理學，理應歸於經學中，至於援佛入儒的禪學，稱之為理學，則明顯有誤。因此要尋求理學內涵，應回歸經典，而非空談性理。平心而論，陽明學派在中國學術史上，確有相當之價值，但末流積弊，既已如此，舉國人心由厭倦而憎恨，學術必然走向救偏補弊之途。

於是顧憲成、高攀龍等人鑒於學風頹敗，朝中小人充斥，乃在東林書院提倡救世救民的教育事業，志切世道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。¹⁴於是他們在東林講學，裁量人物，訾議國政，期望以清議之力量，對於官僚及士大夫的行徑有所針砭，顧憲成指出惟有躬行實錢，才是解決理學空疏的良藥。另外晚明以張溥、張采為代表的復社學者，也開始提倡以古代實證方法，樹立求真的學風，以此批判理學，這些都對於明末清初顧炎武、黃宗羲等人的「言必證實，言必切理」的實證精神有深刻的影響¹⁵。

清初諸儒提倡經世致用和批判理學的空疏，以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，關心國是，抨擊弊政，提倡經世之學，黃宗羲「矯良知之弊，以實踐為主」¹⁶，可見矯弊之意，由虛返實遂為風氣，如梁啟超即概括清學，特重「實事求是」、「無徵不信」治學方法，在研究範圍上，「以經學為中心，而衍及小學、音韻、史學、天算、水地、典章制度、金石、校勘、輯逸等等」，「而引證取材，多極於兩漢，故亦有『漢學』之目。」¹⁷至此開啓清學一返於漢學之

¹²陸隴其：《三魚堂文集》卷二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頁2。

¹³顧炎武：〈與施愚山書〉，《亭林詩文集》卷三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頁16-17。

¹⁴詹海雲：〈清初實學思潮〉，《第一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中山大學中文系編印，1989年11月，頁13-14。

¹⁵參見王有紅：〈學術原因是乾嘉漢學興盛的根本原因〉，《長安大學學報》，2003年第9期，第5卷第3期，頁7。

¹⁶江藩：《漢學師承記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2月）卷八，頁135。

¹⁷參見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5年2月），頁10。

風氣。

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中為清代學術之變遷，作了一段簡明扼要的論述：

國朝經學凡三變：國初漢學方萌芽，皆以宋學為根柢，不分門戶，各取所長，是為漢、宋兼采之學；乾隆以後，許、鄭之學大明，治宋學者，說經皆主實證，不空談義理，是為專門漢學；嘉、道以後，又由許、鄭之學，導源而上，《易》宗虞氏以求孟義，《書》宗伏生、歐陽、夏侯，《詩》宗魯、齊、韓三家，《春秋》宗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。漢十四博士今文說，自魏、晉淪亡千餘年，至今日而復明，實能述伏、董之遺文，尋武、宣之絕軌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。¹⁸

從皮氏所言清代變遷之大勢，可看出清代漢學與宋學彼此消長之軌跡，一代學術之形成，自有其學術內在理路可尋。

二、政治措施

滿洲入關之後，所處文化環境丕變，「馬上」可以得天下，但未必能治天下，於是在崇滿的統治基礎上，同時運用「以漢治漢」的方式，採取以下幾項措施：興文字獄、崇儒重道、編定群書等文化統制政策。

1、興文字獄

中國歷代主事者為了統治上的需要，往往對臣下的言論進行思想控管，當事人在其詩文等文字著作，或某些言論中，流露出對現狀不滿情緒，或觸及到對當朝忌諱的人或事，即根據其思想傾向捕風捉影而予以治罪，即所謂的「文字獄」。

¹⁹

清代「文字獄」案從順治朝始，明亡後，明代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十分留戀故國，對於從關外入主中原的滿族統治者，充滿敵意，於是排滿、反清復明的情緒，便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。清廷以滿族的少數欲統治多數的漢人，一直有如履薄冰之感，尤其對知識分子有更高的警覺心，為遏止反清復明之思想，統治者於是運用高壓策略，以文字獄來懲治觸犯禁諱者。

¹⁸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9年11月），頁64。

¹⁹此說法參見胡奇光：《中國文禍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1-7。

康熙朝駭人聽聞的文字獄，為數不多，大抵都是未親政以前的事，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訴官吏徼功，未必出自朝廷授意，然而作品中流露出對明朝的眷戀，即遭遇不測，仍然使讀書人寒心。²⁰至雍正朝文字獄更遠超過康熙朝，其中汪景祺、查嗣庭、呂留良之獄，都是雍正帝匠心獨運羅織出來的²¹，其中以呂留良案為最特殊，呂留良結識黃宗羲等人後，慕其不仕清的氣節，使他思想丕變，其著述中特別強調華夷之別，要保持民族氣節。於是雍正時羅織呂氏勾結吳三桂罪名，以所著書籍充滿反清思想，所以查抄呂留良家，株連呂氏子孫及學生，呂留良發棺戮屍，並通知各省府州縣將其所著詩集、文集、日記等已刊刻及抄錄者，予以焚燬。

自此以後，朝廷更加密切注意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，類似的文字獄案頻頻舉發，清廷對漢人思想禁錮，更將當時學者、大家推向隱逸之路，終身不願出仕。至乾隆在位時，文字獄更達高峰，於乾隆四十二至四十八年（西元1777-1783），短短七年間，記載下來的案件，竟多達五十餘起²²，堪稱中國古代文字獄之最。文字獄是清朝統治最不光彩之一事，其中牽連之廣，受害之多，懲處之慘烈，反映清朝統治者走向高壓專制的一面。

根據蕭一山在《清代通史》一書，提及清代文字獄造成的影響，主要內容如下：

凡著作中稍有指斥清廷者，皆動興文獄……殘酷毒狠，牽連動數十百人，其箝制言論，束縛士林，實無以復加。重以舉發者可以弋獲功名，於是漸開告密之門，而學者亦惴惴不自保。匪特不敢抗議朝政，即稍涉時忌之學術，亦不敢講習之。英拔之士，其聰明才智既無所發抒，不得已乃鑽研於章句訓詁之中，以為自遣藏身之具。²³

此中不僅道出土人對此噤若寒蟬，顯示當代之學術氛圍並不自由，在禁錮士人自由意志之下，只能鑽研章句訓詁之學，所以蕭一山認為此為清代漢學之所以興起的因素之一。

²⁰此說參見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7。

²¹此說參見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7。

²²參見彭國棟：《清史文獻志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9 年 9 月），頁 90-134。

²³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，頁 764。

2、崇儒重道

清統治者入主北京以後，首先便制定了「表彰經學，尊重儒先」的文化政策，清世祖入關一個月，隨即襲封孔子第六十五代孫孔允植為衍聖公，而五經博士等官襲封如故，到了康熙朝以後，儒家學術更成為國家獎掖學術的重心，康熙云：

自古一代之典，必有博學鴻儒，振起文運，闡發經史，潤色詞章，以備顧問著作之選。朕萬機餘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學之士，用資典學。我朝定鼎以來，崇儒重道，培養人材，四海之廣，豈無奇才碩彥，學問淵通，文藻瑰麗，可以追蹤前哲者！²⁴

康熙將儒家思想貫徹於治國的實踐中，其頒布著名的「上諭十六條」，強調以教化為先，云：

朕惟至治之世，不以法令為亟，而以教化為先。其時人心醇良，風俗樸厚，刑措不用，比屋可封，長治久安，茂登上理。蓋法令禁於一時，而教化維於可久。若徒恃法令，而教化不先，是言本而務末也。朕今欲法古帝王，尚德緩刑，化民成俗。舉凡敦孝悌以重人倫，篤宗教以昭雍睦，和鄉黨以息爭訟，重農桑以足衣食，尚節儉以惜財用，隆學校以端士習，黜異端以崇正學，講法律以儆愚頑，明禮讓以厚風俗，務本業以定民志，訓子弟以禁非為，息誣告以全良善，誠竊逃以免株連，究錢糧以省催科，聯保甲以弭盜賊，解仇恨以重身命。²⁵

治天下者，莫過於正人心，厚風俗，所謂治道以教化為先。康熙推崇程朱理學，主持編定《朱子全書》，並因此開展教育，獎崇儒學政策，創設博學鴻儒科，選拔孝行兼優，文詞卓越之人。振興文教，獎勵書院設立的政策之下，自雍、乾以降，書院儒風丕振。

自康熙首倡宋儒理學，繼之雍正、乾隆，皆一脈相承。然康熙皇帝對朱熹理學的大力提倡，另有鞏固統治的意圖，藉由儒家思想的文化認同以達到懷遠柔近，治漢撫民的功效，也是勸勉臣民忠君愛國的思想利器。同時康熙接受陸隴其、

²⁴ 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卷七十一（台北：華聯出版社，1964年1月），頁11。

²⁵ 《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》卷三十四，頁10-11。

李光地等人的建議，結合治統與道統為己任，使統治者搖身變為道統的「守護者」。換言之，即是皇權成為政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，並塑造出符合儒家「內聖外王」的「聖君」形象²⁶，確立自身的統治地位，以緩和滿漢民族之矛盾，使民族關係趨於融洽。

影響所及，原來的抗清志士黃宗羲，當他目及清統治者各項政策：留心文治，倡導綱常名教，優禮大臣，體察下情等做法時，其著作後來也就採用清朝年號，稱為「本朝」、「國朝」。對於清統治者來說，正是體現了高明的政治手腕，和對當時政治與文化格局的準確判斷，得以迅速完成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。

3、編定群書

清代在大力促進文教的同時，還組織人力、物力編纂圖書，刊行儒家經典，既為學校提供教材，也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，促進社會教化作用，以利長治久安。早在順治年間，印行《御注孝經》、《易經通注》等，並開始倡議修《明史》，可惜因戰事未休，人才難尋，卒未竟功。遲至康熙十七年再次開局，滿漢碩儒皆參與修《明史》，康熙極為重視，將此事視為國之大政，歷時四十年，至康熙去世前方完稿，雍正時再修訂，於乾隆初年定稿、刊行。

以修《明史》為開端，編纂圖書與整理典籍由此邁向高潮。康熙朝編纂儒家典籍，可略分為三類²⁷：一、日講講義：有《日講四書解義》、《日講書經解義》、《日講易經解義》、《日講春秋解義》等，折衷漢、宋諸家之說以成。尤其將《日講書經解義》先譯成滿文，一併送給王公貴族及大學士們，供其學習，此一舉措無疑是推進了滿族貴族儒學化，有利於滿漢文化的融和。二、整理舊籍：包括重刊《性理大全》、《周易本義》、《四書章句集注》彙而名為《朱子全書》，以頒行天下，尊崇儒學的康熙皇帝，其頒行天下使士人誦讀，如此又擴大政治對學術的影響。三、闡經之作：像是《周易折中》是鑑於自宋以來，論《易》經者眾說紛紜，特令李光地以朱熹《周易本義》與程頤《易傳》為本，號稱「數百年分朋立異之見，至是而盡融；數千年畫卦繫辭之旨，乃至是而大彰矣」²⁸，對於儒學經典表彰，於此可見。

²⁶參見黃進興：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：政治化的「道統觀」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第58本第1分（1987年3月），頁105-121。而有關康熙結合「治統」與「道統」說法參見高翔：《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29-31。

²⁷此分類參照葉高樹：《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》（台北：稻香出版社，2002年7月），頁199-202。

²⁸乾隆敕纂，紀昀編修：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總目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、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，1999年11月）卷六〈經部六·易類六·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〉，頁4。

至乾隆一朝，編彙圖書更豐，如《續通典》、《續通志》、《續文獻通考》、《清通志》等，這些通典除部分重修外，大都是續前人之作，補其缺漏，始能真正貫通古今。其他如《滿洲源流考》是乾隆所關注之著作、《欽定盛京通書》是地方志中的重要著作、《大清一統志》、《清乾隆內府輿圖》、《皇輿西域圖志》、《醫宗全鑒》、《授時通考》、《樂律全書》等等，都是乾隆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叢書。

康熙、乾隆對傳統文化的整理，尤其以《四庫全書》為代表。《四庫全書》發端於乾隆六年，乾隆下令徵集圖書，以充實皇宮藏書，開始全國蒐集古書、軼書的活動。四庫全書館隨之成立，根據統計，至乾隆五十八年最後刊出，持續二十餘年，共收書三千五百餘種、七萬九千卷，總字數接近十億字。共刊刻七部，總共為五十五萬三千多卷，二十五萬二千冊。耗費人力，所網羅的學者近四百人，謄錄人員達三千八百四十一人²⁹，論其規模，投入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之巨，以及全書內容浩繁，無疑是中國歷代空前絕後之文化創舉。而其中參與的學者專家，大都為漢學家，故四庫館可謂是漢學家的大本營，《四庫提要》可謂是漢學思想的結晶³⁰，相較於朝廷自康熙以來都是提倡宋學，到乾隆朝時，漢學派已取得全面優勢。

從康熙、雍正經乾隆，清朝官修圖書之多，實屬罕見，為編纂各類典籍，全面總結歷代文化，清朝先後成立了一系列專門機構，諸如國史館、實錄館、方略館、律例館、三通館、明史館、圖書集成館、四庫全書館等等，這些機構有些是常設的，有些是階段性的。每開一館，均需經費、館員、設館址等，如沒有雄厚的物資、人力、財力的支持，是無法達成的，由此正可反映出康、雍、乾盛世的經濟繁榮以及文化之鼎盛。

貳、漢、宋學之消長

錢穆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引論中云：

治近代學術者，當何自始？曰：必始於宋。何以當始於宋？曰：近世揭橥

²⁹此統計數字參見李治亭、王劍：〈論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徵〉，朱誠如、王天有主編《明清論叢》，第三輯，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1年4月），頁278。

³⁰此說參見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31。

漢學之名，以與宋學敵，不知宋學，則無以平漢、宋之是非。³¹

因此要了解漢、宋學問題，就必須導源於宋人對漢代學術之批評，要了解宋人何以批評漢學，就必須先分析漢學之內涵及流弊。

武帝設五經博士後，研經與利祿相結合，經學家為鞏固自身地位，於是牽附災異、圖讖，只是詮釋工作流於鉅釘瑣碎，以致經書中蘊含的聖人之道，轉為經師所忽略，也就成為宋儒攻擊的話柄。

自漢至唐，學者關注焦點有所轉移，於是以韓愈為首，展開唐、宋時期復興儒學運動，也是宋代儒學之興的肇始者，錢穆也認為「治宋學必始於唐，而以昌黎韓氏為之率」³²。韓愈復興儒學的根本宗旨在於「文以載道」，希望重新提倡孟子所建立的道統，〈原道〉一篇道出其思想綱領：

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楊也，擇焉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

33

這段話說出其道統的觀點，聖人之道至孟子而中斷，間接證明漢人僅能傳經，不能傳聖人之道。於是這股恢復道統的訴求，宋代有王禹偁、歐陽脩等人的尊韓運動續加推動，程顥、程頤也深受影響，以為漢、唐之儒雖努力注經，卻無法傳聖人之道，到朱熹時，承其師之說，更將二程加入傳道行列。朱子說：

及孟子歿而其傳泯焉，則其書雖存，而知者鮮矣……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，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，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。³⁴

朱子儼然以道統之傳自居，然自韓愈至程頤，雖強調道統的傳承，卻未談及道統真傳理念為何？至朱子始悟出聖人之真傳，即《尚書·大禹謨》所說的「十六字心傳」，朱子說：

³¹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57年10月），頁1。

³²錢穆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1。

³³韓愈：〈原道〉，《韓昌黎集》卷一（台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年3月），頁10。

³⁴朱熹：〈大學章句序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6年4月），頁2。

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，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。其見於經，則「允執厥中」者，堯之所以授舜也；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堯之一言，至矣，盡矣！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，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。³⁵

朱子以爲這十六字心傳，是堯傳給舜，舜傳給禹，代代相傳，於是千餘年後，二程、朱子始將已斷絕的道統承續下來，宋人遂以「爲往聖繼絕學」的姿態自居。漢學自此受到鄙視，宋儒極力批駁漢儒，以傳承聖人之道爲己任，開始對漢儒所傳之經、漢儒的經說以及其研究成果進行全面性的懷疑，以凸顯他們在儒學傳承中的地位。

宋人於是開始爲每一部經書重新注解，這些注解到了宋末，逐漸官學化。明中葉以後，學者有感於宋人之言的不合理，和經注的種種闕失，提倡漢學的學者日益增多。最值得注意的是《書傳會選》，明太祖與群臣論天和日月五星之行時，因感於《蔡傳》之謬誤，書中計改定有六十六條之多，足見宋人經說有不少疏漏，而這本由朝廷敕撰的書來匡正宋人經說之誤，對宋學權威，自是一大打擊。林慶彰教授更舉出：像是王鏊重新反省宋學，肯定漢學之功，以及楊慎倡導重視漢唐古注疏之論等，使學者慢慢形成一共同信念：以爲漢儒去古未遠，所傳之經必有宋儒所不及者。他們不但重新肯定漢人傳經的功勞，且以爲宋人之學實來自漢人，漢人之學承自先秦，道統並未至漢人而絕。³⁶再加以晚明的王學末流，道學墮入禪學，明代學者早已揚漢抑宋，至清乾、嘉時，已成就前所未有的漢學興盛時代。

首先讓宋學大受打擊的是清初閻若璩、胡渭，二人根本否定了宋儒賴以立身的重要支柱。閻若璩的《尚書古文疏證》證明《古文尚書》有許多篇幅是後人偽造的，《大禹謨》爲晉人梅賾所獻偽《古文尚書》五十八篇中的一篇，所以朱熹所據以《古文尚書·大禹謨》所說的「十六字心傳」，從根本上就被推翻了，閻若璩指出：

《荀子·解蔽》篇「昔者舜之治天下也」云云，「故道經曰：人心之危，

³⁵朱熹：〈中庸章句序〉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頁 14。

³⁶此說法參見林慶彰：〈明代的漢宋學問題〉，《東吳文史學報》，5 期，1986 年 8 月，頁 12-17。

道心之微，危微之幾，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。」此篇前又有「精於道」、「一於道」之語，遂彙括為四字，復續以《論語》「允執厥中」以成十六字。³⁷

人心道心，本出《荀子》，以竄入《大禹謨》，遂尊為經，久而忘其所自來矣。³⁸

於是宋儒據以為根本的道統心傳，徹底瓦解，此對宋學造成極為重大之打擊。

而第二個重要考據是胡渭考證《易圖》，北宋出現了黑白點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此後邵雍又創作了《先天圖》，並且言為伏羲所畫。到朱熹作《周易本義》，把這些圖放在《周易》經中，置於卦象和文字之前，於是這些圖就成了《周易》的源泉，是上帝所賜，聖人所畫的聖圖。胡渭的《易圖明辨》廣徵博引，論證黑白點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出於宋代，而經書中所說的《河圖》只是一種祥瑞。因此黑白點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並非聖物，是受道教影響下的產物，出於宋代的偽造。至於《先天圖》也是宋代才出現的，也是方士講述煉丹的圖，如此一來，朱熹《周易本義》的地位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。³⁹

經過清代漢儒的考證，宋學根基動搖，於是儒學又回歸經典，不再任憑主觀議論，而是要依賴大量考據、引證，方可說明經之本義。於是清代漢學從毛奇齡始揭「漢學」、「宋學」，其後全祖望繼起尊漢儒之功，至乾隆初，惠棟潛心經術，以窮究漢《易》為家學，揚起漢學旗幟，開啓「古學」之先河。其後戴震崛起，他承先輩江永之教，於惠學兼收並蓄，遊學南北，名噪京城，後被延入《四庫全書》館，與邵晉涵、紀昀等眾多名儒，校理群籍。自此漢學得清廷優容，大張其勢，如日中天。⁴⁰

在漢學大行之時，仍有江南詩人袁枚、姚鼐、翁方綱、章學誠等人唱為別調，但聲勢不及。在當時的漢學陣營中，由於江藩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、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的問世，揚漢抑宋，將漢、宋學判然兩分，更激起宋學家方東樹著《漢學商兌》以迎擊，力斥江藩《漢學師承記》之非，演成激烈的門戶紛爭，此一論爭，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個新的論戰開始，實則可視為漢、宋學論爭的一個總結。⁴¹

³⁷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二，第三十一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12月），頁244-245。

³⁸閻若璩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二，第三十二，頁249。

³⁹參見李申：《中國儒教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2月），頁903-904。

⁴⁰參見陳祖武：《中國學案史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年4月），頁213-214。

⁴¹此說可參見張淑紅：〈《漢學商兌》與清中葉的漢、宋之爭〉，《南開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4年第1期，頁44。王家儉：〈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——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〉，《清

江藩所著的《漢學師承記》中，不斷標榜漢儒之功，根據方東樹的說法，漢學家指責宋學的主要論點有三：

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，為害於家國；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，墮於空虛心學禪宗，為歧於聖道；一則以其高談性命，束書不觀，空疏不學，為荒於經術。⁴²

關於第一項指責，方東樹並未明確回應，但持平而論，根據第一點的說法，宋儒講學確有標榜門戶，然漢儒又未嘗沒有門戶之見，其立論實難立足。⁴³而方氏回應多集中在後二項上，針對第二項，也正是漢學家攻擊的重點，焦循譏其曰：「宋儒言性言理，如風如影」⁴⁴，江藩亦談道：「濂洛關閩之學，不究禮樂之源，獨標性命之旨。」⁴⁵戴震言之更為有力：

程朱以理為如有物焉，得之於天，而具於心，啟天下後世，人人凭在己之見而執之。

理以禍斯民，更淆之以無欲之說，於得理益遠，於執其意見益堅，而禍斯民甚烈，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，安得不以意見當之。

聖人之道，使天下無不達之情，求遂其欲，而天下治。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悉無憾是為理，而其所謂理者，同於酷吏之所謂法，酷吏以法殺人，後儒以理殺人，浸浸乎舍法而論理，死矣，更無可救矣。⁴⁶

針對漢學家對於宋學言心、言性、言理的指責，方氏則釐清理學一詞之本義，他說：

理者，許慎說為治玉之名，吾以此詁猶後起之義，要之條理、義理、文理皆本天道之自然，故曰天理。凡見於六經載籍者，古今無異論。……夫以

史研究論叢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4年7月），頁77。

⁴²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序例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3月），頁1。

⁴³此說可參見王家儉：〈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——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〉，頁71。

⁴⁴參見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頁40。

⁴⁵參見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頁40。

⁴⁶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頁42-43。

堯舜周孔之聖學，號而讀之曰道，循而求之曰理，此古今之通義。⁴⁷

方東樹大抵說明宋學言理之本，在於六經典籍之中，並將此道歸之於堯舜以下之聖學，因此宋學之理，即為聖人之道。又特別強調「心」與「理」之關係，其論道：

不知此理託於何物以傳邪？若以理貫徹古今，而無不同，但隨時隨筆，隨人取用，自無不足，無待於傳，則是古聖賢經典文字皆可廢。夫理具於心，無古今一也。今言理而不許言心，譬如言：「世人但取足於米，不必言禾」此不為童昏之見邪？⁴⁸

方氏以米喻理，以禾喻心，心與理之關係，猶如禾之含米，二者不可分。而針對儒佛之分際，他作了以下說明：

余嘗驗之，心之不正，總由意之未誠，誠意祇是決定主意，不為惡耳。此處堅決之志，用力之勤，蓋與佛同，而其下手工夫、次第效驗，則與佛學迥異。儒者之功，先在於精。既得，則在於一、在於允中；佛則祇有止念之一法，而無所謂精。精是格物、致知、窮理、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許多工夫在先。故訓為擇，中是不偏不倚，五性全備，佛祇有一仁，而偏於慈，其餘萬事俱廢。故曰：次第效驗不同，佛止曰明，儒者必曰固執。

49

方氏的儒佛之辨簡明而精闢。儒家與禪佛皆根源於心，然二者迥然不同，無論在傳心的過程或是目的則各不相同。儒家所求的是涵養的工夫，以便入世；佛家所求的是一歸於無，為出世之念，因此本質上是有重大的差異。

有關於漢學家對於宋儒的第三項指責，他們批評宋儒「束書不觀，空疏不學，為荒於經術」，在方東樹看來，宋儒雖高談義理之學，但不因此而偏廢於典籍之研讀，他以朱子為例，強調宋儒對於經書的訓詁也是非常重視的，他說：

⁴⁷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上，頁 5-6。

⁴⁸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頁 31。

⁴⁹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中之上，頁 28-29。

考朱子教人為學，諄諄於漢魏諸儒，正音讀、通訓詁、考制度、釋名物，以為當求之注疏，不可略。又曰，秦漢以來，聖學不傳，儒者惟知訓詁、章句之為事，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，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。然或徒然誦其言以為高，而不知深求其意，遂致脫略章句，陵藉訓詁，坐談空妙，而其為患，反有甚於前日之陋者。又曰，自秦漢以來，儒者不知反己潛心，而以記覽、誦說為事。是以有道君子，深以為憂，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觀，坐談空妙，為可傲倖於有聞也。⁵⁰

由方氏之言可得知，程朱之學亦重視訓詁、名物，同時兼顧訓詁與義理。故漢儒所謂宋儒高談性命，束書不觀，只能針對明末王學之流而發，對於程朱之學，實屬不合。⁵¹然而朱子所賴以為本之「十六字心傳」出之於偽的考證，仍是宋學無力回擊的事實。

然而方東樹為捍衛自身陣營，歸結出漢儒之學有六蔽：

其一，力破理字，首以窮理為厲禁，此最悖道害教。其二，考之不實，謂程朱空言窮理，啟後學空疏之陋。不知朱子教人，固未嘗廢注疏，而如周程諸子所發明聖意經旨，迥非漢儒所及。……其三，則由於忌程朱理學之名，及宋史道學之傳。其四，則畏程朱檢身，動繩以理法，不若漢儒不修小節，不矜細行，得以寬便其私。……其五，則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，及其新慧小辨，不知是為駁雜細碎，迂晦不安，乃大儒所棄餘，而不屑有之者也。其六，則見世科舉俗世，空疏者眾，貪於難能可貴之名，欲以加少為多，臨深為高也。⁵²

以上六端，蕭一山認為「乃方氏之反覆究論者，其實無一能中肯綮」，並認為方東樹在所著《漢學商兌》中，「常有一概抹煞之論，實根本錯誤也」⁵³。

清代學術史上，漢、宋學之爭論早在清初已露出端倪，到乾、嘉時期，漢學極盛一時，宋學雖高居廟堂之上，卻無法與之分庭抗禮，於是宋學一直處在守勢。嘉慶以後，雙方論爭由暗轉明，從《漢學師承記》與《漢學商兌》相繼刊行後，

⁵⁰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下，頁154。

⁵¹此說可參見王家儉：〈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——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〉，頁71。

⁵²方東樹：《漢學商兌》卷下，頁148-149。

⁵³蕭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中，頁784-785。

漢、宋之爭達到顛峰，雙方旗幟鮮明，言辭激烈，漢、宋二方爭論焦點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一如晚近學者所言，清代這場漢、宋之爭，基本上就是一面倒，讓漢學家佔盡了上風，⁵⁴但漢學家之貢獻也確為清代留下燦美之一頁。從以上我們對漢、宋學爭論之探討可以發現：探尋經書中的聖賢之道，亦即講明義理，乃是漢、宋之間的共識。⁵⁵質言之，以宋學家之工作，長於思想、義理，以求人之宇宙觀、人生觀；以漢學家之工作，長於文字、名物，以求考古之正確，是兩者可以同時並存之明證也，⁵⁶是以漢學與宋學在清代學術史上，皆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，難以一概抹煞的。

綜上所述，可歸納為以下幾端：一是清廷高壓統治，學者轉為考據訓詁，然學者用心所在又豈是避禍而已，更有其學術脈絡的演變，揚漢棄宋，直究經典，維繫文化傳統之作用，而其師承所在彰顯儒林之生命，此為漢學師承之貢獻。二是分別漢、宋固然有門戶之見，前人也以門戶之見視之，但江藩之作，除漢學師承，亦有宋學淵源，其分別而作，有保留清世學術真實面貌之用意。清儒之努力，自此有其傳承，有其彰顯，而諸儒之成就可以蔚為一代之學的成就，於此可見。

藉由本章節之觀察，將有助於了解江藩對於漢學家與宋學家之論述基礎，從旁了解江藩如何建立清代漢學家與宋學家之歷史定位，及經學家之時代意義。

⁵⁴王家儉：〈清代的漢宋之爭的再檢討——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〉，頁 78。

⁵⁵此說參見潘振泰：〈清代「漢宋之爭」的宋學觀點初探--以方東樹的「漢學商兌」為例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，第 20 期，2003 年 5 月，頁 231。

⁵⁶張君勱：〈中國學術史上漢宋兩派之長短得失〉，《中國哲學思想論集》（台北：牧童出版社，1978 年 2 月）第五冊，頁 227。